

社会理论译丛



农民的终结

LA FIN DES PAYSANS

[法] H. 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 著 李培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农民的终结 · 农民的终结 · 农民的终结

F356.53
1

· 社会理论译丛 ·

农民的终结

LA FIN DES PAYSANS

[法] H. 孟德拉斯 著
李培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农民的终结

· 社会理论译丛 ·

著 者 / [法] H. 孟德拉斯

译 者 / 李培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项目经理 / 邓泳红 (email: zqzdyh@yahoo.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65286768

责任编辑 / 云 纤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

字 数 / 248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339 - 0 / D · 099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03 - 8824 号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农民的终结》中文版再版 译者前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著作《农民的终结》，是我在十几年前翻译的，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3000册，只是在农村研究的学术界流传。但进入21世纪后，很多人搜寻此书而难以找到，甚至负责农村工作的国家高层领导也专门调看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并委托我约请孟德拉斯教授专门为该书中文版的再版写一个前言。但当我2003年年中与孟德拉斯教授联系时，却从他女儿那里得到他病重住院的消息，本想等他病愈后再与他谈写前言的事，但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却传来噩耗，孟德拉斯教授于2003年11月5日在巴黎病逝，终年76岁。

孟德拉斯教授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社会学的专业训练，深受芝加哥学派注重经验研究的学术传统影响，他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时，曾是反传统的“田野教学派”的一员。该学派强调研究必须建立在经验调查基础上的重要性，反对在象牙塔里做学问，认为理论的反思和推论必须扎根于定量的调查统计资料或定性的调查案例资料。孟德拉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跨学科的经验研究，来构建默顿（R.K. Merton）所倡导的“中程

理论”。而他一生景仰的社会学大师、92岁高龄的默顿，就在2003年2月早他8个多月仙逝。

《农民的终结》一书1967年首次出版时，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因为法国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却面临农民文明的终结，不能不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冲击。但20年后，当《农民的终结》在法国再版，孟德拉斯为该书增写20年的变化时，几乎没有人再对孟德拉斯提出的命题质疑了。1970年代，孟德拉斯领导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社会变迁观察课题组”，在遍及法国的60个观察点进行了连续的社会变迁调查，从而把他关于“农民的终结”的命题在更广泛的社会变迁中展开。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paysan）到“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ermier）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出量并不会因此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产出大国的原因，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

英国作为最老牌的工业大国，可能是发达的大国中农民比例最少的国家，但在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的长达30年的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在全都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也仅从1.9%下降到1.3%。英国的乡村田园风光和生活情调在欧洲也是有名的，从喧闹、拥挤和节奏紧张的城市到乡村去，你会感觉到鲜明的对比：绿色的田野中放牧的牛羊，蓝

天白云下式样别致的农舍，清新的空气和淳朴好客的农民。当然，尽管乡村还存在，农业还存在，农户和农庄还存在，农产品仍供应有余，但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早已经终结了。

在那些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农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分成三部分人：一是占有生产资料、只负责经营的农场主；二是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大部分劳作的自我雇佣的农业生产者；三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被雇佣的农业机械的操作者，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农业工人。经营性农场主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于中型企业经理，自我雇佣的农业生产者也相当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操作农业机械的农业工人相当于技术工人。总之，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从业者，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被融入了后工业社会，并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他们已成为一个很小的社会职业群体，研究农民的学者寥寥无几了，议会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大型专题调查的数据中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作为农民象征的传统价值已愈来愈失去共鸣，他们的后代中留在乡村继续从事农业的也愈来愈少了……但农业劳动者仍然是整个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

1997年，孟德拉斯在接受法国《人文科学》杂志的采访时说，关于“农民的终结”这个命题，从农业政策的角度看，政治家们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他们认识到要使农业尽可能成为一个竞争性的生产部门，与此相反，从政治发展的方面看，政治家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革命的意义，他们仍然经常把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影响等同于过去农民的影响。

在十多年前，“农民的终结”这个话题，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

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的 19 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巨变”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些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巨变”目前已经在加速进行。

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

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农村、农业、农民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一再引起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因为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虽然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这样下去，务农农民将被抛在中国现代化的列车之外。

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期盼着通过和平崛起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衡量指标。最为人们所关切的指标，大概就是人均 GDP，这个指标包含着很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信息，也比较容易进行国际比较，但人均 GDP 的指标也会掩盖很多信

息，比如它不能反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贫富悬殊等方面付出的代价。

社会发展的测度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社会技术，不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指标，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使普通的农民能够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中国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看看中国城市里林立的吊车和脚手架，不会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怀疑。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奋斗，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而那将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坎坷的历程。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都不再能够脱离这个大的背景孤立地发展。中国的耕地资源紧缺，人地关系紧张，平均每个农户只有约半公顷的耕地，绝大多数都是“小农”经营。尽管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与国外很多国家户均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的“农场”经营相比，竞争上还是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户兼业、政府扶持农业等，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这种大的背景和必然的趋势，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的“新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现在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据不完整的统计和学者的估算，目前全国有上亿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替代乡镇企业职工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关于进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劳动保护、

社会保障、医疗待遇、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立法。近几年的失地农民也突然激增到数千万，各种不断扩张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的圈地，使这部分农民的数量快速增长，地权的重组、变更、利益分配以及其中很多农民从失地走向失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另外，由于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都市等原因，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的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困难。

“新三农问题”涉及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是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前线”，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热带”。

在“新三农问题”中，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失地失业的农民。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成为最大的收益，而这块收益能否公正、公平分配，也成为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侵害，他们应当获得的土地收益，往往被开发商转移和侵占，使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民集体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民个人，得不到合理的利益补偿。

土地是务农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摆脱贫困地位和抵御生活风险的最后依托，要高度警惕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大量外流造成大量城市新贫民。在中国目前近80万个村落中，很多村落的农民正在大量地失去土地，他们的农业耕作史断裂和终结了，而村落的历史还在延续。在这种延续的历史中，故事的主题似乎并没有改变。从传统农村的土地族群冲突到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从土地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到分田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宅基地纠纷到土地流转中的矛盾，从国家的征地到现在土地租用收益的分配……村落故事的主题，始终

都是围绕地权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上亿的农民工在支撑着中国梯度推进的工业化，但近十多年来，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数千万农民在城市化的圈地中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但他们中很多人在失地的同时也沦入失业的境地。每一年都有上万的村落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消失，这些数千年的村落解体以后，农民怎样融入与它们完全不同的城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社会，还是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面对现实，攻克难点，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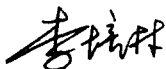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首先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而使农民合理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2002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改革开放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限制在20年以内，也就是说，要使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0元的水平，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以前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轻以致逐步取消农业税费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

做出一些重大的选择。但目前急需解决的，是防止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对农民的剥夺。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就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紧张，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 2.5 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这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 1.5 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 1 亿多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 1.5 亿劳动力，目前的 3.6 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的 2 亿多人，即使按 2020 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 70% 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 1.5 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 40% 是外出务工收入，一些省份（如四川省和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所以用法律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农民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防止农民因失地而失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还要加快把农民转变成市民的速度。城市具有经济聚集效益和福利设施共享效用，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把解决“老三农问题”与解决“新三农问题”结合起来，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拓展到农村之外，逐步减少农民，把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要注重利用传统的社区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农民融入他们陌生的城市。城市的各级管理者，应当做出把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的具体规划，在户籍、住宅、就业、劳动保护、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制度设计和保障。

1980~2004年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把约2.5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这种巨变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上都不曾发生过。这种“巨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对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理解和解释这个“中国经验”，对中国农民的发展前景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我相信通过《农民的终结》来了解他国的经验，对于概括和总结“中国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2004年8月于北京

乡下人！一个奇特的古词。渔夫、猎人、农夫、牧人，人们现在还能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吗？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他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经常地谈论，人们称之为“农民”。

G. 塔德：《未来史片断》，1896年

目 录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1

第一部分 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第一章 变迁的力量和机制 25

第二章 土地、劳动和时间 50

第三章 家庭和经营 81

第四章 一项变革：杂交玉米 104

第二部分 农业劳动者及其企业和社会

第五章 企业家及其决策 141

第六章 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和状况	177
第七章 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	211
结 论 可能的未来	245
跋 二十年之后	272
附 录	
参考书目	308
人名索引	324

导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马尔萨斯的忧虑首次重新变得如此现实。在所有的国家，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得更快。从全球来看，农业的生产过剩不再会是令人恐惧的了，食品的欠缺变得令人焦虑不安，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农学家们发出报警的呼声。“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农业潜力起初曾使他们产生过幻想。他们曾认为，某些先进的技术就足以使那些方法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增长 1 倍，有时甚至增长 10 倍。但 R. 杜孟作为先驱者之一，首先惊愕地发现，一种技术，尽管十分先进，当它没有被农业劳动者接受和使用时就都不会有任何帮助。然而，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在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 1 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 10% 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

对于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社会科学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呢？有客观历史的研究，有经济学家们近来对增长问题发生

的兴趣，有一些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还有社会心理学界关于人们对变化的态度的某些研究，但没有任何综合性的研究，没有任何可以指导执政者的政策和负责人的行动的整体理论。这就很容易理解，当农学家断言“黑非洲起步不好”（杜孟，1962）^①时，社会学家却只是提出质疑：“黑非洲能否起步？”（梅斯特，1966）这种令人痛心的对话，当会引起正直人的愤慨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的羞愧。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

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由于受工人阶级的诞生、资本主义企业惊人的效率以及货币构成的唯一手段所迷惑，它们对没有工资、没有企业主、没有货币条件下运转的社会体系失去了兴趣，然而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大多数国家属于这种社会体系，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属于这种社会体系。

只有一些研究农民的专门作者继承着古代和中世纪农学家的伟大传统。但M.多巴瑟、F.诺沙都、A.葛斯帕林和L.拉沃邦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往往只是在重复瓦隆、科伦麦尔、塞尔或罗兹埃教士所说过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观察家，对于农

① 本书的所有注解都是根据原法文版译出的，这里注明的是参考著作的作者和出版年代，可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根据人名和年代查到书名。下同——译者。